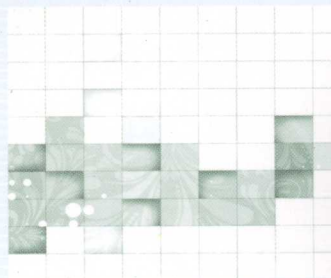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美服务贸易研究

ZHONGMEI FUWU MAOYI
YANJIU

任 靓/著



3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著

中美服务贸易研究

ZHONGMEI FUWU MAOYI
YANJIU

任 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服务贸易研究/任靓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41 - 6945 - 4

I. ①中… II. ①任… III. ①中美关系 - 双边贸易 -
服务贸易 - 研究 IV. ①F752. 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4567 号

责任编辑: 王柳松

责任校对: 王苗苗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邱 天

中美服务贸易研究

任 靓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bs. tmall. com](http://jjkxbs.tmall.com)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 印张 200000 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945 - 4 定价: 36.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本书以中美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中美服务业的开放、中美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中美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等方面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问题。本书在介绍中美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事实开放度和承诺开放度分别衡量了中美两国服务业的总体开放情况和部门开放情况;通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构成的指标体系,全面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运用G-L指数分析了中美对全球市场以及中美之间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情况和部门情况;此外,通过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测算了中美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并给出了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最后,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的区域合作,在介绍中美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现状的基础上,以美国的双边投资谈判为核心,探讨了中美BIT中美国的谈判动机和中美双方的谈判以及应对策略。

本书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服务业的事实开放度和承诺开放度均低于美国,服务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小于美国;
2. 中国服务贸易呈逆差,且逆差程度不断扩大;
3. 中国服务业总体比较优势不强,且低于美国,但在建筑服务上具有一定优势;

4. 中美之间在服务贸易上的合作有限，分工不充分；
5. 中美两国的总体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和互补性都不强，但美国在旅游、保险、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费等部门的出口同中国进口的互补性较强；
6. 中美两国在运输、旅游、计算机和信息以及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费等部门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7. 中国人均 GDP 和中国服务业规模同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人均 GDP 和美国人均 GDP 同中美之间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服务业规模、美国服务业规模以及中国服务业引资同中美之间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8. 中国人均 GDP 和服务业规模是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同时，中国人均 GDP 也是中美之间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原因。

任靓

2016年3月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2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8
1.3.1	研究目标	18
1.3.2	研究内容	19
1.3.3	研究框架	20
1.3.4	研究方法	21
2	中美服务业开放分析	22
2.1	中美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22
2.2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23
2.2.1	中美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情况	23
2.2.2	中美服务贸易部门发展情况	25
2.3	中美服务业总体开放分析	29
2.3.1	服务贸易视角下中美服务业总体开放度	29
2.3.2	开放承诺视角下中美服务业总体开放度	31
2.3.3	提供模式视角下中美服务业总体开放度	32
2.4	中美服务业部门开放分析	33

3 中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38
3.1 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基础	38
3.1.1 比较优势理论	38
3.1.2 要素禀赋理论	45
3.1.3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下的服务贸易	46
3.2 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	48
3.2.1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48
3.2.2 中美部门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49
3.3 基于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的分析	53
3.3.1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显示性竞争优势	53
3.3.2 中美部门服务贸易显示性竞争优势	54
3.4 基于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	56
3.4.1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	57
3.4.2 中美部门服务贸易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	58
4 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分析	60
4.1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度量方法	60
4.1.1 Grubel 和 Lloyd 度量法	60
4.1.2 Brulhart 边际 (动态) 度量法	62
4.1.3 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横向、纵向分解法	63
4.1.4 Balasa 度量方法	64
4.1.5 Aquino 度量法	64
4.2 中美总体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65
4.3 中美部门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67
4.4 影响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分析	72
4.4.1 基本影响因素	72
4.4.2 实证分析	74
5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139
5.1 中美服务贸易竞争性分析	139

5.1.1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竞争性分析	140
5.1.2 中美部门服务贸易竞争性分析	141
5.2 中美服务贸易互补性分析	142
5.2.1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互补性分析	142
5.2.2 中美部门服务贸易互补性分析	143
5.3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144
6 中美服务贸易区域合作分析	146
6.1 中美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现状	146
6.2 中美 BIT 谈判中美国的谈判动机	151
6.3 中美 BIT 谈判中美国的谈判战略	155
6.3.1 中美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比较	155
6.3.2 中美 BIT 谈判中美国的谈判战略	158
6.3.3 中国应对中美 BIT 谈判的策略	158
7 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161
7.1 优化产业结构	161
7.2 调整服务贸易结构	162
7.3 积极促进区域合作	162
7.4 扩大服务业开放	163
参考文献	164
附录 中美服务贸易相关数据	176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球产业结构轻型化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014年,世界各产业占比情况为:第一产业约占4.5%,第二产业约占29.5%,第三产业约占66%;此外,高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69%,中等收入国家的该项比重约为49%,低收入国家该项比重约为45%。不难看出,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等收入国家也在从工业经济社会向服务经济社会过渡,同时,低收入国家在努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与其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保障。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约为21%,尽管从绝对值上看,该值远低于货物贸易的比重,但近年来,服务贸易的增长幅度却远高于货物贸易。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2014年,两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两位,双方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喻,在全球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上同美国差距不小:2014年,美国服务业占其GDP比重约为77%,而中国仅为49%;美国服务贸易占其总贸易比重约为23%,而中国该指标为13%;美国的两个指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的两个指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服务经济的发展强国,努力输出其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品,同时其积极加强全球服务业合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加之欧美等在服务业发展上具备优势的国家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已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希望能进一步形成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协议,故积极推行《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这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集团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表现;TiSA的谈判主张利用“负面清单”的谈判模式,目前,已有48个国家加入了TiSA的阵营,覆盖了全球70%的服务贸易,中国已于2013年9月30日正式提出加入TiSA。这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软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本书从多个方面分析对比中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一、关于服务业开放的综述

(一) 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测度的研究

布朗(Brown, 1940)首次提出“相互依存”的概念,外贸依存度是度量对外开放度最基本的指标,即采用进出口贸易量之和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来表示,该方法计算简单,在学界长期被广大学者运用。但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等因素在影响对外开放度,因此,该种测算方法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它不能全面地反映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用贸易政策来衡量对外开放度,他们主要运用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指标来进行度量。安德森和尼瑞(Anderson & Neary, 1994)认为,当关税是唯一的贸易

保护措施时,可采用平均关税率来测度贸易开放度。爱德华兹(Edwards, 1992)认为,非关税壁垒覆盖率仅体现了一国非关税壁垒措施运用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运用最为广泛的度量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之一是道拉斯指数。道拉斯(Dollars, 1992)认为,在开放条件下,相同商品在所有国家内的价格都是一致的,因此,该商品的国内价格指数和国际价格指数的差距是由贸易保护导致的,故可以用这种商品价格的相对差异程度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进而提出了道拉斯指数,该指数越高,该国对外开放程度越低;反之越高。

萨克斯和华纳(Sachs & Warner, 1995)通过选择五个与贸易规则和制度有关的判断标准,采用二进制法判定一国是否开放(称之为S-W指标体系法)。如果一个国家满足五个标准中的任意一条,则被认定为不开放,对外开放度为0;如果不符合五个标准中的任意一条,则被认定为开放,对外开放度为1。该方法最大的改进,是实现了对外开放判别标准的多样化,更加全面地衡量了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其最大的不足是,对结论的划分较为极端,仅有开放与不开放两种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爱德华兹(Edwards, 1998)将已有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综合,从这些测量方法中选择合理的方法形成一种新的方法。爱德华兹法并没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他仅对其他学者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归纳,但该方法对对外开放度测度的准确度有了明显提高。

利默(Leamer, 1988)利用H-O模型,根据SITC的划分,对53个国家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贸易强度,用贸易强度的估计值与实际值的差值衡量对外开放度。帕特里克(Patrick, 1998)利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人口数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三个因素对“对外贸易依存度”做回归分析,并将修正的结果用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斯图华特(Stewart, 1999)提出采用一国和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国内学者对对外开放度测量的研究比较一致,采用的方法是对影响对外开放度的因素赋予权重,然后对其进行加总,即为一国的对外开放度。

(二) 服务业开放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研究

拉姆克申·S. 雷简(Ramkishen S. Rajan, 2002)以中国、印度尼

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这几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认为金融和电信服务的有序开放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且可以间接促进该国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伍华佳、张莹颖(2009)基于国际服务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传导机制,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检验了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作用渠道包括物质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并进一步探索了中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陈凯(2008)实证分析了中国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认为人力资本的水平层次同服务业内部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正相关,劳动力成本与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负相关。李惠中(2002)以两部门理论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档消费服务和生产者服务领域。姜建平、赵伊川(200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与服务业增长之间正相关,但中国服务业基础较差,应逐步放宽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官敬、桂丽雯(2009)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引进FDI、改善服务贸易结构和促进技术扩散等加速了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和升级。魏作磊(2006)通过扩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1984~2003年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远超过服务业和农业,认为中国服务业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增加值的上升效果不明显。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发展的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如果将服务视作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那么,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影响的理论,就适用于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 Stiglitz, 1977)在论文《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种类》中构造了D-S效用函数,将产品种类作为决定消费者效用的因素之一,为考虑产品种类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分析框架。马库森(Markusen, 1989)将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纳入D-S生产函数中,认为生产者服务自由化可能导致大量收益。克鲁格曼(Krugman, 1979)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技术更先进,可以

替代本国的中间品,而且可通过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带来比国内中间品更高的经济效益。迪尔道夫(Deardorf, 1979)通过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发现,贸易壁垒的原因导致中间品的存在而提高最终产品的价格,甚至最终产品价格会高至过于昂贵而导致无法继续生产,当最初国家是该最终产品的成本最低生产国也依旧会出现此种情况。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 1991)的研究表明,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垂直效应”,即国内厂商通过引进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能够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鲁滨逊、王和马丁(Robinson, Wang & Martin, 2002)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建立了CGE模型,估算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和影响,发现服务贸易能够提高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能够提高那些对服务投入需求较高产业的生产率。

在实证研究方面,总体的研究结论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费尔南德斯和帕诺夫(Fernandes & Paunov, 2012)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生产性服务业对智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能够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活动。弗朗索瓦和沃尔(Francois & Woerz, 2008)采用1994~2004年间OECD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服务进口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服务进口与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服务进口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进而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正向作用更为显著。沃尔夫梅耶(Wolfmayr, 2012)从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服务价值出发,度量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研究表明服务对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有正向作用。达根、瑞哈杰和瓦雷拉(Duggan, Rahardja & Varela, 2013)利用OECD的外商直接投资规制限制指数衡量服务业开放度并测算了印度尼西亚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部门FDI的开放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张艳、唐宜红和周默涵(201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服务任务的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均匀,对东部地区企业、使用较多服务中间投入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和出口企业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更大；而对于国有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陈启斐和刘志彪（2013）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投入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进口，并回归分析了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进口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彭水军、李虹静（2014）在此分析基础上，运用中国1987~2007年间9张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投入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进口，结果显示主要服务部门均促进了制造业出口贸易，但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刘艳（2014）运用5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相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更突出，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四）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一，关于服务业FDI动因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服务业跨国投资的不断增加，服务业跨国投资得到了理论界的大量关注。然而，对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在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应用，这些成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经过经济学家们的不断完善，对服务业跨国投资领域也适用。

除了理论研究外，学者们也从实践角度研究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动因。温斯坦（Weinstein，1977），鲍尔和特斯库（Ball & Tschoegl，1982），特普斯特拉和于（Terpstra & Yu，1988）认为，国际运营经验对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李继韬、盖斯兴和史蒂芬（Li Jitao，Guisinger & Stephen，1992）研究了影响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开放度、市场规模、文化差距、全球寡占反应是主要因素。李继韬（Li Jitao，1994）实证研究了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问题，认为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和目标市场上的区域范围经验是其国际化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拉夫洛克、克里斯托弗·H. 和乔治（Lovelock，Chrisopher H. & George，1996）认为，相

同的顾客需求、全球性顾客、全球性销售渠道、全球规模经济、有利的物流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政策以及可转移的竞争优势等,是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纳祖姆和基布尔(Nachum & Keeble, 2000)以伦敦中心区专业服务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跨国公司形成的外部网络是其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阿罗尼和纳祖姆(Aharomi & Nachum, 2000)认为,服务业跨国公司扩张的因素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客户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二是自身竞争优势的提升;三是国际服务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四是服务产品可贸易性的提高。他们更强调企业的特殊资源在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研究

弗朗索瓦(Francois, 1990)从生产者服务与分工的角度,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证明了服务业FDI可以产生与比较优势有关的收益和效率,同时还可带来由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而导致的额外收益。J. 拉纳等(J. Rana et al., 2007)研究发现,随着FDI的流入,中国民营企业受损,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受益,且中国引进外资竞争的政策较随意。赵玉娟(2011)根据17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通过技术溢出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FDI没有对国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服务业技术进步的渠道是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何俊(2012)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利用FDI的比重偏低,服务业FDI利用效率不高,各省区市在服务业领域引进FDI的业绩和效率不平衡。姚战琪(2013)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FDI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结构不合理,对提高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推动作用有限。陈景华(2013)认为,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增加值有促进作用,且反向影响也成立。向佳(2014)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并比较了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稳定,后者的就业效应明显。何骅(2013)比较了中国“环渤海”、“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居于北部地区的“环渤海”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最显著;其技术进步效应亦如此,三大城市群的就业效应差别不大。

第三,关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的研究

韩梅(2009)认为,中国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但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发展,将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祁春凌、黄晓玲(2012)认为,虽然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国民经济产业格局未发生改变,即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对外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以租赁、商务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租赁、商务以及批发零售业所占比重较高,但这些传统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整体服务贸易的带动较弱。薛美萍(2010)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如提升服务业整体素质、加大政府投入等。

(五) 服务业开放与经济增长

黑尔(Heir, 1985)、萨姆森(Samusen, 1985)、司雷普(Slapul, 1985)等以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为研究出发点,认为服务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马库森(Markusen, 1986)以垄断竞争学说为出发点,认为由于存在专业化受限,因此,仅仅商品贸易不能保证生产的帕累托最优,但服务贸易可使专业化达到最大并保证最优。理查德(Richard, 1988)和库博(Kubo, 1988)等在传统的H-O-S模型的基础上,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引入了技术差异和金融服务贸易等参数,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中是适用的,并证明了服务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弗朗索瓦(Francois, 1990)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与专业化分工及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服务是生产制造过程的互补品而非替代品,生产者服务部门对其他部门厂商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及专业化收益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增长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迪尔道夫(Deardorff, 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服务贸易领域和货物贸易领域的发展,使贸易双方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收益,认为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从而可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利南和马库斯(Konan & Maskus, 2006)以及詹森等(Jensen et al., 2007)根据CGE模型,以突尼斯和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相对于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而言,包括FDI在内的商业服务自由化更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谢尔曼·鲁滨

逊 (Sherman Robinson, 2012) 通过选取 10 个国家和地区 11 个部门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 服务贸易可以影响世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贸易, 同时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也具有重要影响, 该影响主要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实现。

(六) 服务业开放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 由服务业带动的就业问题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们关于服务业开放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比较具体。艾玛 (Armah, 1994)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第三产业就业带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活动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优化就业结构。米特拉 (Mitra, 2009) 以印度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 认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和服务业就业增长同时存在, 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显著。周申、廖伟兵 (2006) 使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 1997 ~ 2004 年间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1997 ~ 2000 年间, 服务出口的就业促进效应和服务进口的就业替代效应呈下降趋势, 2001 ~ 2004 年间, 二者均稳步上升, 抵消后, 服务贸易的净就业效应较小。赵成柏 (2009) 根据 1982 ~ 2006 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 研究发现服务进出口与就业数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且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都能够对就业人数的增加起到促进作用, 其中服务出口的促进效应大于服务进口的促进效应。吕义军、李秉强 (2010) 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 1997 ~ 2007 年间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 认为出口导向率和工资水平同服务业就业数量负相关, 进口渗透率和产出与就业数量正相关。范爱军、李菲菲 (2011) 运用协整分析研究了 1982 ~ 2010 年间服务贸易对就业产生的作用, 认为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都能对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且服务出口的促进效应大于服务进口的促进效应。

还有部分学者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角度研究其对就业的影响, 且从这个角度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同前述结论不一致, 即总体观点认为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同服务业就业数量的增加关联性不大。王小平 (2005) 认为, 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的相关性较小, 需要通过服务业体制改革、管理创新、技术引进等措施促进就业的增长。薛敬孝、韩燕 (2006) 认为, 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能提高中国服